

白城英烈

骆汉书 马殿元

骆汉书(1924年—1946年),马殿元(1921年—1946年),二人均为江苏省阜宁县人。骆汉书生前任大赉县五区区长,马殿元生前任大赉县五区农会主任。骆汉书与马殿元从小在一起读书,长大以后,目睹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心中充满愤恨不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寻求救国之路。1941年,二人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3师8旅。骆汉书曾任班长、排长、连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我军派遣大批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收复失地。1945年冬,骆汉书、马殿元随军挺进东北,接收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开辟东北解放区。这时,蒋介石公然撕下伪善的面具,急不可待地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独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从海、陆、空三路运送大批兵力到东北,并不顾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于1945年11月中旬,悍然挑起了东北内战,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控制了主要铁路和大中城市。占据了长春和农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向外扩展,威胁着白城市周围各县。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指出东北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以弱,主要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认为要改变这种形势,必须充分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自卫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大批干部被派到白城市一带开辟工作。1946年3月,骆汉书、马殿元被派到大赉县五区开辟工作。这时的五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刚刚结束,一些地主、汉奸、国特、官僚等封建势力和敌伪残余另换招牌,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个“官”,那个“长”,什么借粮、摊派不断,继续为非作歹,加之土匪遍地,保安队横行,社会动乱不堪,民不聊生。骆汉书、马殿元没有被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所吓倒。他们积极开展工作。白天开大会,宣传我党政策,帮助农民群众干些农活。晚上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与群众谈心。使他们了解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对和对土地的热切要求。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躲在暗处的不准群众翻身、随时准备反扑的反动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首先组织了区武装队、江防队,负责沿江防务、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积极工作。4月上旬,骆汉书、马殿元根据吉江省委发出的目前工作方针和群众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反奸清算、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恶霸、反富农、反伪满警察特务及伪满时代恶劣的行政人员等敌伪残余势力的斗争,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五、四”指标下达以后,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反奸清算和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他们组织4个乡农会、11个村农会。同时,村农会还建立了自卫武装“模范班”。村农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防匪锄奸,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群众,开展土改,组织生产,解决纠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展起来了。一向被地主剥削和压迫的贫雇农开始觉悟。他们纷纷和恶霸地主清算剥削账,牵走了地主的马,分了地主的浮产,粮食和青苗。一倒压心头多年

的苦水,控诉地主的罪行。经过反奸清算斗争,初步打击了地主的反动气焰,发动了群众,骆汉书、马殿元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与群众更加密切了关系。随着斗争的发展,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经过反奸清算斗争,虽然反动的封建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他们经验不足,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有的农会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对地方搞了假斗争;有的群众觉悟不高,在清算地主时,明分暗不分,白天分到的果实,晚上又送回去了。这时,反动的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妄想扼杀红色政权于摇篮之中,他们采取煽动诱惑、内外勾结的手段,策划农会叛乱。1946年7月,地主王明武找来一些农会干部在家中秘密集会,策划与江东“秧子队”(政治土匪)共同包围五区区政府,狂叫“把骆汉书斩草除根,把区政府和农会一打光!”会后,他们又派人到处串联,商议暴乱事宜,并暗中造谣,煽风点火。在这种形势下,山湾乡、东山头、根宝店、又古散农会相继叛变。8月30日清晨,嫩江东岸的山西红网房子一带突然枪声大作,骆汉书听到激烈的枪声后,忙派通讯员周宝和与一名区队队员到江畔探听情况。二人没见到任何人就返回区政府作了汇报。骆汉书误认为是江东的“胡子”要来袭击,便派周宝和去通知东山头和又古散农会去江边的菜园子网房子为江防队布置防守任务。周宝和通知了又古散村农会后,与会长崔士民等人一起离村去江边。当行至村农会西墙外的地头时,受崔士民等人指使预先埋伏的土匪,地主突然从高梁地里钻出来,缴了周宝和的械,在他们的威胁恫吓下,周宝和供出了骆汉书的行动计划。叛匪经过密谋后,来到嫩江岸边的样子口网房子,见到东山头农会会长张万发等叛匪已经到达那里,他们遂商定结伙设伏。下午4点,骆汉书等人到菜园子网房子给江防队布置任务后,又去东山头村,在村边遇见迎面跑来的张万发,张报告说周宝和被土匪劫走了。骆汉书便命令他去样子口面探听情况,张万发乘机逃走。骆汉书急忙在村里找了一名“模范班”人员带路去样子口面网房子。来到网房子院内,骆汉书急忙下马直奔网房子上屋走去。这时,埋伏在西仓子南头的地主张玉珍从背后向他开了枪,子弹从后腰射入,贯腹穿出。刹那,血流如注,骆汉书便倒在地上。接着,地主王兆刚又补了一枪,打在骆汉书的左腿上。之后,叛徒张万发恶狠狠地用套子枪朝奄奄一息的骆汉书胸部猛击数下。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就生在地主、土匪、叛变农会干部之手。嫩江岸边枪声大作时,马殿元刚开完斗地主大会,正在腰里掏朱家大院西南角杜权家休息。受地主王明武指使,毕武山、李禄二人前去抢马殿元的枪。他们二人一起来到杜权家,见马殿元正躺在炕上看书,便上前搭讪。马殿元见状生疑,正欲起身时,毕武山扑上前去与其厮打,李禄也随即动手。毕、李二人将马殿元抱住用木棒猛打,抢下马殿元的匣枪。因二人不会使枪,使用枪柄砸伤了马殿元头部,跑出去。马殿元苏醒后,忍痛撕下一条面袋布包扎了头上的伤口,又找到了一支洋炮,然后,进入朱家大院西北角的



用烈士骆汉书名字命名的“汉书村”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



用烈士马殿元名字命名的“殿元村”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

炮台里进行抵抗。这时,杜权受到朱家兄弟等人的唆使,便假称要帮助马殿元,骗取了他手中的洋炮。于是,朱家大院里的人破门而入,到院院背来麦秸、秫秸放在炮台门口并用木棍往里塞。这时,叛匪队长贵乘马殿元在炮台上的小窗户向外张望之机,用洋炮将马殿元打昏。王明武一见便吩咐点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转眼间烈烈翻腾。马殿元被这些地主、土匪、叛徒活活烧死在炮台里。为了纪念骆汉书、马殿元同志,中共赉广县委(1946年9月由大赉、安广两县合并而成)于1947年春决定将五区所在地端基屯改为汉书村,将根宝店屯改为殿元村。1983年,大安市民政局选择新址为骆汉书、马殿元烈士修筑水泥墓碑,重新安葬了烈士的遗骨。(七十八)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白城记忆

这段岁月带来的收获、实现的成长,将沉淀为永恒的财富,为未来积蓄力量。为未来积蓄力量。我看我说。这个假期,因疫情的到来变得格外与众不同,也因师生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变得厚重而有意义。我们常说,生活即教育。这段特殊的日子,何尝不是一段最好的教育、一节最生动的课堂、一本最有价值的教科书,有关人生、有关成长。从这本教科书中,探寻生命的意义。抗击疫情的过程,我们看到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最美身影,看到驰援武汉的各地医务工作者写下“不计报酬,不论生死”的请战书,看到钟南山院士红肿的眼睛与李兰娟院士疲惫的面庞……我们还看到众多身边的英雄,许多家长,他们既是孩子们的父亲,也是学生的老师、更是患者的医生,还是关键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许许多多的他们,自愿请战,投身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孩子们诠释对于生命、对于祖国、对于人民的理解与敬畏。在这段特殊的日子,生命、生活和生态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同学们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思考如何与自己相处、与自然相处、与世界相处这重要的人生课题。从这本教科书中,体悟责任与坚守。付出、奉献、责任、坚守,这些原本对于孩子们略显抽象的概念,在这个假期变得鲜活而生动。每一位老师,既要负责孩子们的教育教学,也要负责家庭教育的科学指导;既要负责班级的疫情防控上报,也要担任疫情期间德育教育与心理辅导;既是维系学校正常运转的一员,也是孩子们可亲可爱的在线“主播”……非常时期,每一位老师都练就了非常之功,创造出无数的非同寻常。他们以最大的诚意、最艰苦的付出,在这段岁月留下了最特殊的印记,也以行动为孩子们诠释了何为奉献付出、责任坚守。从这本教科书中,实现自我激励与成长。这段日子,同学们主动思考有关尊重、规则等社会话题,探讨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学们在对抗焦虑、情绪、自我管理、自觉学习,用实际行动践行“21天形成一个好习惯”;同学们积极践行清华附小成志少年“一身好体魄、一手好汉字、一副好口才、一篇好文章、一项好才艺”的育人理念,感受“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师生们都相信,或许我们会遇到不同形式的艰难困苦甚至不幸灾祸,但一定能做到最好的自己。种下责任的种子,相信岁月的力量。与疫情战斗的日子终究会结束,但这段岁月带来的收获、实现的成长将沉淀为永恒的财富,为未来积蓄力量。

诗词鉴赏

春晓

[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赏析]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五绝,是我们几代人上学伊始就遇到的古诗,清新的诗句,抑扬的音调,配上稚嫩的声音,已经成为国人共同的童年记忆。诗句很简单,没有什么深意,描绘的只是诗人在一个春晓静卧枕上的所闻所感,却自然描绘出春晓特有的宁谧、清丽氛围,勾起中国人的共情共感,因而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春天的早上,诗人从一场酣眠中醒来,不觉已是天光大亮,耳畔传来鸟儿的啁啾声,枝头、空中、檐下、脊上,处处皆是。所谓“晓窗窗外啼春晓。睡未足,把人惊觉”,或许正是鸟儿窗外啼鸣,才将诗人从酣梦中唤醒。正如陆游诗所云“鸟雀呼鸣报快晴”,鸟儿的啼鸣,报告了天晴的消息;诗人忽然想起,昨夜风雨潇潇,不知何时已停止,怕是有许多花儿被吹落在地了吧?一、二句由视觉到听觉,是实写;三、四句则是想象之辞,是虚写。在虚实之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天已破晓,也许才刚“初闻窗一点明”,也许已是“啾啾初日注窗明”;鸟啼清脆,风雨初歇,似乎让我们感受到雨后初晴天宇的明净;花落知多少,又让我们想象落花遍地、枝叶凝露的景致。想来此时衾褥尚暖,残梦依稀,诗人慵卧枕上,并不急于出门欣赏,只是静静谛听、默默发问,却将春晓的自然景象真切传达出来。杨万里《春晓》(其三)说:“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不必开窗赏花笑,隔窗花影也欣欣。”可谓是孟浩然知音。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春晓更是让人留恋不已。古人以“春晓”为题的诗不计其数,看重的都是春朝的好光景。宋人尤带诗云:“沧海升朝日,春光满太清。”(《春晓》)明人卢宅仁诗云:“旭日出扶桑,晴光映芳草。”(《题县八景》)其六《洲渚流芳》都只嫌描绘太实,不如孟浩然的《春晓》自然。蔡襄《春晓》诗说“东风气味浓于酒”,也许细品这春晓的“气味”,就应在似梦似醒之间吧。(雨果)

方寸之间话口罩

司徒一凡

现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为患者动手术的场景,票名分别是“针刺麻醉”“断肢再植”和“中西医结合针灸治疗白内障”,成为迄今全套口罩数量最多的邮票。1990年3月3日面世的一套2枚(诺贝尔、白求恩诞生一百周年)邮票由我国与加拿大联合发行,其中“白求恩在加拿大”邮票的背景图案为白求恩与三位医生正在进行外科手术,他们都戴着口罩。这也是我国第一套与外国联合发行的邮票。2003年5月9日发行的《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邮票小版张右上角边纸图案是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医护人员的头像,她的双眼清纯明亮、充满希望,展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口罩还具有防寒保温的作用。1975年9月26日发行的一套3枚《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邮票中的“五星红旗再次飘扬在地球之巅”,采用一幅登山队员站在珠穆朗玛峰上展开五星红旗的合影照片,其中可见佩戴护目镜的登山队员们也都戴着口罩。阻隔有害粉尘和有毒气体是口罩的另一功效。1964年12月30日推出的一套8枚《化学工业》邮票之“医药”,以一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正在制药车间内工作的技术人员为主图。1975年12月15日面世的一套5枚《农业机械化》邮票之“棉田防治”,图案描绘三名戴着口罩的农机技术人员正在田间喷洒农药,防止农作物的病虫害。



1976年4月9日推出的一套4枚《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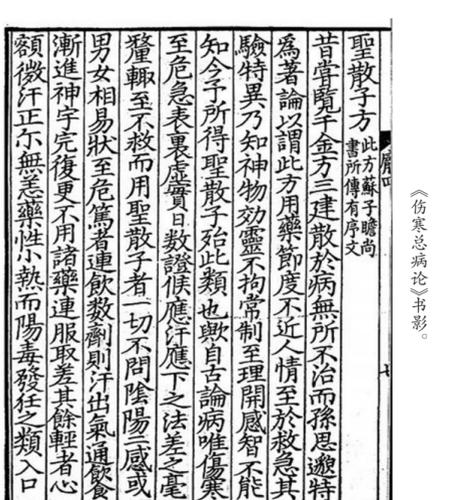
在当前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口罩因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必备防护用品而备受关注。笔者借此机会梳理出我国历年发行的出现口罩图案的邮票,与读者一起在方寸之间寻觅口罩的不同功用。口罩是医护人员的标配,起到隔绝细菌和病毒的作用。1969年9月25日发行的一套12枚《人民公社》邮票之“卫生保健”,右上角背景图案描绘了医院病房常见的场景:一名佩戴口罩的护士端着托盘送药,病人躺在病床上,也戴着口罩。这是口罩首次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1976年4月9日推出的一套4枚《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票中,有3枚的图案再

苏轼与圣散子方

崔洁 黄海涛

苏轼在地方任官时,曾以圣散子方治时疫,后来他将这个方子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所著《伤寒总病论》中。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十八年后,也就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度来到杭州任官,出任杭州知州。苏轼再至杭州,当地因大旱歉收,《宋史》记载“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又请求朝廷赐给度牒(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足),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苏轼拿出一个名叫“圣散子方”的药方。这剂药方用料便宜,“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救活民众无数。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巢谷喜欢研究药方,这剂圣散子方被巢谷视为至宝,连亲生子也不舍得传授。苏轼在黄州任官,恰出现疫病,苏轼再三求方,巢谷应允了,但要他指江水为盟,绝不外传。苏轼口头答应,心里却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应该

流传后世才是。为了治疗更多百姓,苏轼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伤寒总病论》,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所以应设立“病坊”。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坊事由僧人管理。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后来采用置田获利的方法。这在当时也很普遍,书院、义庄等设施也多置田产以使资金来源稳定。据史料记载,苏轼还将收到“某宣德”的一笔“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的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苏轼在杭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以圣散子方治疫病仅是其中一端。杭州人民感激苏轼的恩德,家家挂有其画像,“饮食必祝”。两浙转运司对苏轼的做法也很赞赏,向朝廷上奏了苏轼建安乐坊之事,并建议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赐紫衣(赐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及祠部牒各一道”,改安乐坊为安济坊。后来,广州疫病流行,在广州任官的苏轼友人王敏仲来信求助,苏轼把他在杭州战“疫”的经验介绍给了他。苏轼认为“救药病坊,政不急于此者矣”,此前王敏仲已向苏轼说过“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疫疫时,所损多矣”,并且“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与杭相类”,苏轼建议“莫可掣划一病院,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乃长久之利,试留意”,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留意于长久之计策。



《伤寒总病论》书影。